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ISSN 1674-0351, CN 61-1456/C

##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构建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深度贫困人口脱贫机制  
作者： 胡军，吴理财  
DOI： 10.16223/j.cnki.cn61-1456/c.20200229.006  
收稿日期： 2019-12-08  
网络首发日期： 2020-03-02  
引用格式： 胡军，吴理财. 构建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深度贫困人口脱贫机制[J/OL].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https://doi.org/10.16223/j.cnki.cn61-1456/c.20200229.006>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构建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深度贫困人口脱贫机制

胡 军<sup>1</sup> 吴理财<sup>2</sup>

(1.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2.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决胜阶段,深度贫困人口因其复杂组合性、极度脆弱性和时空延展性而成为脱贫攻坚工作的“艰中之艰”。基于可持续脱贫的目标导向,构建以农户为单位的精准扶贫方略与“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的大扶贫格局有效结合的治理思路,在对深度贫困人口的生成与再生产逻辑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可以从构建精准的问题解构机制、有序的发展适应机制、深度的社会联系机制三个层面入手,将各方的扶贫优势转化为治贫效能,进而有效破除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难题。

**【关键词】**深度贫困人口;可持续性;脱贫机制;农户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20)01-0000-00

## 一、“深贫”人口与脱贫的 可持续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为了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资源进入到贫困地区、落实到贫困人口身上,使得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sup>[1]</sup>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采用常规思路和方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sup>[2]</sup><sup>34</sup>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精准脱贫要坚持现行标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加大攻坚力度,提高脱贫质量。”<sup>[3]</sup>这表明,深度贫困问题仍然是脱贫攻坚的难点,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必须重点攻克的。根据李小云的分析,在政策上对于深度贫困的表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深度贫困地区;二是深度贫困群体。<sup>[4]</sup>从脱贫实践来看,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重点要攻克的地地区,但脱贫最终是要落脚在深度贫困人口身上。

**【收稿日期】**2019-12-08

**【作者简介】**胡军,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吴理财,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方政治、乡村治理、文化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有效治理视角下的农村返贫防范机制研究(19YJC810004);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有效治理视角下的‘深贫’脱贫机制研究”(SK2018A0103)。

在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中，国家实行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将精细化的“精、准、细、严”理念内化为基层扶贫现实的方略<sup>[5]</sup>，它的要旨就是找出最贫困的人口进行扶贫干预。李小云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的具体指向则在政策文本中有清晰的表述，但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并不必然属于深度贫困人口，政府也没有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机制上再明确谁是深度贫困人口。<sup>[4]</sup>热内费耶夫·库碧称之为“最穷的人”，指的是没有收入、资源，只有为维持他们的生活而通过社会救助分给他们的那一点。<sup>[6]</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度贫困在群体分布上，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众。<sup>[7]</sup>国务院扶贫办洪天云副主任进一步阐述为三类人可算作深度贫困人口，即因病致贫人群（特别是重病和慢性病群体）、因灾和市场行情变化返贫人员、贫困老人。<sup>[8]</sup>从深度贫困人口的本质来看，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深度贫困具有绝对贫困的基本属性，指个人或家庭长期处于要素资源短缺或环境极度恶劣的状态，不能维持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sup>[9]</sup>

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首要的在于精准瞄准，也需要综合性的治理思路。葛志军、邢成举认为，作为村庄的整体和作为贫困户的个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精准扶贫的内在悖论<sup>[10]</sup>，过于强调个体发展性会弱化村级发展能力，而单方面强化村级能力又会忽视个体的行动。而高飞则特别强调在整合型贫困治理框架之下发展集体合作经营，并构建了一个“国家—集体—农户”的三重减贫框架。<sup>[11]</sup>徐晓军、孙权认为通过“支部引领+产业带动+集体兴村”的新型集体化路径有助于摆脱村民因原子化的个体能力贫困而难以实现精准脱贫的困境。<sup>[12]</sup>丁建军等也强调深度贫困治理的综合性，但这种综合是针对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贫困陷阱相互“叠加”的结果。<sup>[13]</sup>张明皓、豆书龙提出从“价值—制度—内容”三者联动的层面打出“组合拳”<sup>[14]</sup>。相比而言，周立更强调深

贫主体与环境的有机结合，实现“志—智—制”的立体化扶贫。<sup>[15]</sup>不论是集体化还是体系化的治理方式，对于实现深度贫困人口的如期脱贫都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但从脱贫到可持续脱贫仍有一定的差距，为了实现深度贫困人口脱贫的可持续性，必须正本清源，在重新梳理深度贫困人口的生成与再生产逻辑的基础上，进行可持续脱贫机制的发掘。

## 二、“深贫”人口的生成与再生产逻辑

对问题的细致分析蕴含着解决方案。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首要的在于找到深度贫困人口，同时更要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念找到“症结”所在。明确“症结”的关键在于重新细致梳理深度贫困人口的生成特点、主要表现和深层症结。首先，深度贫困人口之所以成为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在于深度贫困人口的“贫”区别于一般性贫困，具有其独特性；其二，深度贫困人口的“度”是生成上的突出表现，是对“深贫”的度量，呈现出极端性的特点；其三，深度贫困人口的“深”反映的是脱贫难度之大，更体现在“深贫”的顽固性上，就蕴含着内在的再生产性。

### （一）生成特点：多维制约与复杂叠加

郭利华认为，深度贫困“不仅是物质匮乏，也包含在投资理财意识、教育机会、饮水卫生及健康、社会资本、社会排斥等能力指标上均落后于平均水平。”<sup>[16]</sup>张明皓、豆书龙则提出“深贫”生成原因上的贫困结构固化和自我发展行动弱化的互构，进而使深度贫困群体不断卷入“经济性贫困陷阱”<sup>[14]</sup>。李春根等认为深度贫困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个体因素等多重因素复杂叠加的结果。<sup>[17]</sup>事实上，对于深度贫困群体来说，其贫困是主体的“弱”与外部结构的“差”持续互构下的结果，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维复杂性。李小云也指出，深度贫困地区区域发展的约束与深度贫困群体内存在的制约改善收入和福

利的很多内在要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多维度的“贫困陷阱”<sup>[4]</sup>。从具体维度上看，“深贫”群体内在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主体的劳动能力弱、技能水平低和脱贫意愿小，区域发展的约束则包含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制度约束等一系列非主体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对于一些连片特困地区，通常集生态脆弱、民族问题、革命老区等于一体。这些地区“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自然灾害多发，地理位置偏远，地广人稀，资源贫乏”。由于偏远所得到的扶贫支持较少<sup>[18]</sup>，无形中使得深度贫困陷入恶性循环。二是叠加组合性。覃志敏认为，深度贫困人口陷入的是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水平低、社会资本不足的“三维贫困”叠加困境。<sup>[19]</sup>实际上，从致贫的多维性中可以看出“深贫”叠加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主体致贫要素的内在叠加，主体劳动能力的弱与技能水平低呈相应关系，也必然会带来主体脱贫意愿小。其二是主客体因素的交织组合。“深贫”主体的“弱”无形中加大了客观条件限制的功效，而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弱化了“深贫”主体的脱贫意愿，进而使其脱贫能力在低水平上重复。在多维因素的复杂组合之下，不仅使得“深贫”治理的“症”很难拿准，也就更难以精准“下药”。

### （二）主要表现：经济与社会的极度脆弱

深度贫困人口的“度”在结果状态上体现为“具有最大的贫困治理难度”，但在过程状态上则表现为经济脆性化和社会弱势化。在经济脆性化上，深度贫困被标识为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脆弱状态，也就是生存性问题还没得到完全解决的状态。正如托尼所说的“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sup>[20]</sup>实际上，在市场机制广泛深入地作用于农村社会的同时，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和波动性正如同这阵“细浪”，会加剧贫困群体经济层面的脆弱性。<sup>[21]</sup>不过，经济上的极度脆弱是呈现出上行发展的趋势，即“在任何社会、任何时间都没有一个维持体能或健康

水平的统一的必需品的清单列表，需求必须与它所属的社会相联系。”<sup>[22]</sup>时代的发展赋予深度贫困人口解决生存问题的成本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也表明其实现脱贫的“两不愁、三保障”经济标准也是不断递升的。在社会弱势化上，深度贫困被标识为一个人或家庭不仅所能够寻求到的社会支持网络极其有限，或者是所寻求到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很难以帮助其摆脱深度贫困的弱势状态。这种有限性和弱势性使得深度贫困的家庭不得不执着于“生存伦理”的需要，从而只能在不断内敛中加剧有限性，深度贫困的个人或家庭只能在总体的社会发展中越来越被孤立，也就越来越难以摆脱深度贫困的状态，进入马克思所说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sup>[23]</sup>自主和支持能力的双弱使得他们将脱贫寄希望于政府的扶持，也就生成了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与习总书记所说的“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sup>[2]</sup>的理念背道而驰。

### （三）深层症结：时空再生产

深度贫困人口的“深”既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的代际传递上，也体现在空间维度上的邻里拓展上。从时间维度上看，正如左停等所指出的，深度贫困之所以被称为“深度”贫困，不仅表现为一定时间点上的收入水平低下与物质匮乏，亦表现为纵向时间维度上贫困的“顽固性”，即贫困具有长期性和代际性的特点。<sup>[24]</sup>深度贫困人口或家庭由于居于贫困的时间较长、较难以改变，容易形成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等，再加上宗教势力和封建迷信等糟粕又不断侵袭和渗透，导致“懒散慢”“等靠要”等现象根深蒂固。<sup>[25]</sup>即使暂时脱离了贫困状态也很容易返贫，并具有代际传递特征。<sup>[16]</sup>即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影响下一代，进而由“不能”到“不愿”去改变现状，整个家庭不断在“贫困陷阱”中循环。正如鲍曼所说，“那些心甘

情愿地把他们的贫困当成天意而接受，不做任何努力使自己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穷人，一旦他们逐渐习惯并且以为自然的少量需求得到满足，他们会对工厂工作的利诱无动于衷。”<sup>[26] 188</sup>从空间层面上看，深度贫困人口容易通过邻里效应产生类聚性，从而呈现“大范围区域性或相对小范围的整村的特点”<sup>[27]</sup>。尤其是当这种人群的类型拟化为贫困文化，“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sup>[28] 156</sup>。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在革新力量的注入，深贫人口都自觉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进行了自适应，这种自适应将使得整个地区都陷入“贫困陷阱”中，也就加大了脱贫的难度，造就了深度贫困的顽固性。

作为深度贫困人口，之所以成为脱贫攻坚的最难点，与其所具备的基本特性紧密相关。一方面，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难题是由其所具备的基本特性共同塑造的。如果说致贫因素的复杂组合性是症结所在，那么极度脆弱性则是深度贫困的具体内容，而时空再生产既是其外在表征，又为“深贫”脱贫蒙上了阴影。另一方面，深度贫困人口所表征的三个基本特性之间又具有互构的关联性。致贫因素的复杂组合性既是极度脆弱性和时空再生产性的基础，而后两者又进一步强化了致贫因素的顽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深度贫困人口真正实现脱贫也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一套有针对性的治理“组合拳”。

### 三、构建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 脱贫机制

“深贫”人口是决胜全面小康道路上的最弱项，他们具有致贫因素的复杂组合性、极度脆弱性和时空再生产性特点，这就决定了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是很难以实现脱贫致富的，更遑论可持续脱贫而不返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动各方力量，加快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人心

齐，泰山移。’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sup>[2] 50</sup>也就是说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尤其是针对最后的“深贫”人口，必须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的大扶贫框架下，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扶贫优势与“深贫”人口的脱贫劣势进行有效对接，在可持续性目标的导向下，转化为“深贫”人口的脱贫效能。

#### （一）构建精准的问题解构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准脱贫是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sup>[29] 25</sup>强调精准，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粗放式扶贫方式的超越，“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sup>[29] 58</sup>简单来说，就是要在解构“深贫”人口致贫因素的复杂组合性基础上，将国家和政府提供的扶贫资源进行精准有效地配置。

一是强化对复杂因素的精细解构。“深贫”人口的致贫因素具有多维复杂性，要保障政府资源能够“对症下药”，必须以多维贫困为视角，对致贫原因进行细致分析。在精细分析主体的劳动能力、技能水平和脱贫意愿等主体性因素，以及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制度约束等区域性因素等在致贫体系中所占权重基础上，充分厘析清楚主次矛盾的排序，进而按照“先重后轻、先易后难”的思路，优先解决主要矛盾，渐进、有次序地解决其他矛盾。

二是强化对要素组合的精确分析。“深贫”人口之所以脱贫难，与致贫要素的复杂组合相关，尤其是主客体层面因素之间的组合产生的叠加性。这就要求在面对复杂的叠加性问题上，必须要精确区分责任，明确问题解决上的主客差异，即让政府在区域客观性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而明确深度贫困人口在主观性问题上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政府要解决阻碍“深贫”人口自主脱贫的限制性条件，也要给予“深贫”人口以足够

的扶持，但却不是代替他们的自主奋斗，而是培育其自我减贫的能力。

三是强化对需求帮扶的精心定位。在厘清致贫因素的复杂性基础上，作为扶贫最强有力主体的政府很自然生成清晰性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这种思路以现代理性为指引，目标指向也相当明确，但往往效果难以保证。正如斯科特所说，“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它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sup>[30]</sup><sup>6-7</sup>实际上，它所忽略的是农民需求的特点。农民的需要具有时间阶段性、发展层次性和内容具体性等特点，扶贫干部只有真正沉下心去，在明确差异性、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化类指导，才能摸清楚以家户为单位的农民的真正需求和需求的变化性，也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扶贫资源用到刀刃上、进入到贫困农民的心坎上。

### （二）构建有序的发展适应机制

深度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最重要的在于适应现代市场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要克服经济的极度脆弱性，而产业则是撬动脱贫、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为此，必须处理好“深贫”农户、产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注重发展长效扶贫产业，着力解决产销脱节、风险保障不足等问题，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直接受益水平。”这表明要通过产业发展克服“深贫”人口的极度脆弱性，要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要保证扶贫产业长效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二是要提高农户对产业的参与度必须让产业适应农户的需要和能力；三是要提高农户的直接受益水平必须处理好产业利益的分配问题。

一是深化产业的市场适应性。产业扶贫的关键就是要选准产业，选准产业首要就是要让产业有市场，探索、挖掘能为其产生高强度收入增长的机会成为破解深度贫困的关键。<sup>[31]</sup>为此，在国家精准扶贫方略的指导下，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根据村庄独特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发展的需要产业合理考量，将市场导向与政

府规划有效结合起来，以防止不顾市场规律的盲目产业“上马”，不仅劳民伤财，也影响深度贫困农户脱贫的可持续性。

二是深化产业的农户适应性。扶贫产业是以为贫困农户增收为导向的，政府不能以产业的未来可期待的利益强制要求深度贫困农民转变生产结构，必须要照顾到“深贫”农户的自主需求层次、劳动力状况和产业习惯，以形成适应性的参与方式。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深贫”人口，要强化实质劳动投入性参与；对于老弱病残或半劳动人口，通过发展公益性岗位和就业劳务补贴的方式参与；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尽可能鼓励发展家庭型的产业。同时，要将针对深度贫困农户的短期脱贫产业与长效扶贫产业进行有序配合，既实现“深贫”农户脱贫的及时性，又实现其脱贫的长效性。

三是深化产业的分利适应性。“深贫”农户的市场抗风险能力极弱，通过组织联结型和大户带动型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劳动参与是脱贫可行的方式，由此发展的产业不是追求要做到多大，而在于产业的可持续性。这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处理好农户与产业“集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对于深度贫困人口来说，“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sup>[32]</sup><sup>185</sup>如果不能在产业的利益分配中处理好“深贫”农户利益与产业“集体”利益的关系，实现脱贫可持续就是一句空话。为此，要探索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既要让“深贫”农户在产业发展中获得可持续的利益而不是被排斥在利益之外，又要让产业能够在足够资本的积累中不断持续下去。

### （三）构建深度的社会联系机制

“深贫”人口的脱贫难度之大，表现在经济上的增收困难，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缺乏。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对集体的依附联系中脱嵌出来，成为独立的家户个体，“为自己而活”是其信条，除此以外别无价值信仰。<sup>[33]</sup>在农户的自由度增加的同时，农户之间的社会联系却在减弱，导致“深贫”人口在时间的作用下与

社会产生隔膜，进而在代际传递上形成恶性循环，甚至产生空间上的扩散效应。所以，要让作为深度贫困农民个体真正脱贫，必须强化个体与个体之间，尤其是个体与基层组织之间的深度联系。通过群体性的力量以消除个体的孤立性，从而化解“深贫”人口的社会脆弱性和时空延展性。

一是活化党组织的政治联系方式。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重要阵地，也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核心力量。习总书记强调要“抓好党建促扶贫”<sup>[34]</sup> 21-22，就是要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中推进其与贫困群众的深度联系。要按照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吸纳年轻党员、能人回村，更新党员干部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同时，要加强党员与群众的深度联系，通过定期访谈、促膝谈心等工作方式“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员等人群的关爱服务，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sup>[35]</sup>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让“深贫”人口在政治上找到归属感，进而通过政治归属引领社会联系。

二是活化村与户的治理联系纽带。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赋之后，基层自治组织的“悬浮化”倾向与农民的“淡漠化”现象的出现弱化了村级组织与农户之间的联系。“深贫”人口作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更加缺乏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自主热情，即便他们接受到来自政府的扶贫资源，也很难难以使其自主生成积极参与的心态。只有让“深贫”人口真正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才能克服时空再生产的症结，保证脱贫的效果经得起检验。一方面，要通过治理重心下移、多层次协商组织构建等多元的联系方式，增强“深贫”人口与村落社区的关联性。另一方面，要在干群关系层面建构一种从动员到自主的治理行动路径，正如左停所说，动力和能力也是在脱贫过程中逐渐增强的，是一个“做中学”的过程。<sup>[36]</sup> 为此，切实改变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充分运用乡村社会的说理、讲情等本土化的工作方法，在有限有效满足

农民的微心愿中提高“深贫”人口脱贫的主动性。

三是活化村民间的社会联系基础。深度贫困的发生往往具有集聚性的群体特征，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基于社区的群体脱贫氛围。虽然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个体化进程加深，进而消解了农民之间的传统互助性，但农民的外化流动并没有完全改变“根在农村社区”的现实，高密度的社会交往和基于共同祖先的象征性记忆的再生产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它能够成为村民联合起来解决自身家庭困难的有效基础。正如博杜安所说，“在欠发达经济体中，社区网络和非正规经济依旧是穷人生存的最佳希望。”<sup>[37]</sup> 96 只有形成这种共同性的社区氛围，贫困农民才能真正找到自身在社区中的价值，而且通过社区的这种互动能够形成对贫困农民的压力，使其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来实现自我减贫。

## 结 语

深度贫困人口既是“贫中之贫”，也是脱贫的“艰中之艰”。在脱贫攻坚进入到最后决胜阶段以来，深度贫困人口是整个脱贫攻坚中最不托底的政治性任务、最艰难的历史性使命。这一切都决定了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治理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利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sup>[38]</sup> 832 为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整合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全方位力量来构建深度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机制。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指导下，以“深贫”农户为单位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扶贫优势进行有效结合，构建具有精准性、适应性和有弹性的治理机制，将扶贫优势转化为治贫效能，进而破除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难题。

### 参考文献：

- [1] 攻坚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回应脱贫攻坚热点问题[EB/OL].(2019-03-07) [2019- 03- 08].[http://www.cpad.gov.cn/art/2019/3/8/art\\_2724\\_95188.html](http://www.cpad.gov.cn/art/2019/3/8/art_2724_95188.html).

-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3]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9-03-05)http://www.gov.cn/zhuanti/2019qqlh/2019lhzfgzbg/index.htm.
- [4]李小云.冲破“贫困陷阱”: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J].人民论坛,2018(7)下.
- [5]王宇,李博,左停.精准扶贫的理论导向与实践逻辑——基于精细社会理论的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6(5).
- [6]热内费耶夫·库碧.贫困:对人权的侵犯[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5(2).
- [7]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7-06-23)[2117-08-3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31/c\_1121580205.htm.
- [8]国务院扶贫办.采取超常规方法让深度贫困地区脱贫[EB/OL]. [2017-07-0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05/c\_1121270531.htm.
- [9]张楚,张守夫.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破解深度贫困问题”新思想[EB/OL].(2017-08-10)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810/c187708-29463391.html.
- [10]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 [11]高飞,向德平.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 [12]徐晓军,孙权.集体化村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有效路径——基于西藏D村脱贫经验的考察[J].河南社会科学,2019(3).
- [13]丁建军,金宁波,王璋.深度贫困生成逻辑与贫困陷阱跨越路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14]张明皓,豆书龙.深度贫困的再生产逻辑及综合性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8(4).
- [15]周立.以“志智制立体扶贫”解决深度贫困[J].人民论坛,2018(7)下.
- [16]郭利华.赋予深度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能力[N].光明日报,2017-11-07.
- [17]李春根,陈文美,邹亚东.深度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致贫机理与治理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9(4).
- [18]陈全功,程蹊.空间贫困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地区扶贫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1).
- [19]覃志敏.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治理[J].中国国情国力,2017(12).
- [20]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21]檀学文,李成贵.贫困的经济脆弱性与减贫战略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10(5).
- [22]杨立雄,谢丹丹.“绝对的相对”抑或“相对的绝对”——汤森和森的贫困理论比较[J].财经科学,2007(1).
-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4]左停,徐加玉,李卓.摆脱贫困之“困”:深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25]郑风田.破解深度贫困的八个要点[J].人民论坛,2018(7)下.
- [26]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0.
- [27]贾玉娇.论深度贫困地区的高质量脱贫[J].人民论坛,2018(7)下.
- [28]Banfield Edward C.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M].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58.
- [2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30]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31]李俊杰,耿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J].民族研究,2018(1).
-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3]吴理财.论个体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J].探索与争鸣,2014(1).
- [34]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3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EB/OL].(2019-06-2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6/23/c\_1124660343.htm.
- [36]左停.如何更好激发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动能[J].人民论坛,2019(6)下.
- [37]史蒂芬·M·博杜安.世界历史上的贫困[M].杜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赵春】